

第一编

大革命时期

(1927 年 1 月—1927 年 7 月)

第一章 余江县概况

第一节 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

余江县位于江西省的东北部，信江流域的中下游。东接贵溪县、鹰潭市，南邻金溪县，西连东乡县，北毗余干和万年县。地处东经 $116^{\circ}41' \sim 117^{\circ}09'$ ，北纬 $28^{\circ}04' \sim 28^{\circ}37'$ 之间。南北长 75 公里，东西宽 28.65 公里，总面积 932.84 平方公里。地势南北高，中间低。南北部群山相连，分属武夷山脉和怀玉山脉，是全县的主要林区。位于县东北角的白鸡母飞上天主峰，海拔 512 米，为全县最高点，也是贵溪、万年、余江 3 县的天然分界线。位于东南角的马祖岩、香炉峰、碓嘴石等是县内的风景区。东部和西部多丘岗地，小山、小岗此起彼伏。中部平坦，田连阡陌，村庄稠密，是全县的主要产粮区。

县内主要河流有信江及其支流白塔河。信江是江西省五大河流之一，源出于玉山县怀玉山，自鹰潭市月湖区流入余江县，由东向西斜穿县境，经余干县流入鄱阳湖，县内长 25.25 公里，流域面积 927 平方公里，宽 350 ~ 500 米，年平均径流量 174.3 亿立方米，是县境内的最大河流。白塔河是信江一级支流，源于武夷山脉铁牛关，从龙虎山风景区流入余江县，纵贯南中部，至锦江镇洲和村汇入信江，县内长 49 公里，流域面积 494.6 平方公里，宽 200 ~ 300 米，年平均径流量 26.54 亿立方米。此外，还有骨

头港、黄庄港、青田港、邓埠港、坞桥港、春涛港、划船港等。这些港除划船港属饶河支流外均属信江和白塔河支流。

全县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17.6^{\circ}\text{C} \sim 18.1^{\circ}\text{C}$ 。最热为7月，最冷为1月。日照时间数 1852 个小时，降雨量 1788.8 毫米。有四季分明，雨量丰沛，气候温和，日照充足，无霜期长等特点。土质为红土、潮沙泥土和水稻土。适宜种植水稻、黄麻、棉花、油菜、大豆、甘蔗、茶叶、蔬菜等农作物和各种亚热带竹木。其中水稻、花生、茶叶是县内主要农产品。

余江县，原名安仁县，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考古学家发现，县境早在夏商时期，我们的祖先便在此地繁衍生息。秦汉时为余汗县晋兴乡，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将晋兴乡划出，设晋兴县。晋怀帝永嘉七年（313），改晋兴县为兴安县，不久废，仍为余汗县晋兴乡。南朝陈文帝天嘉年间（560~566），又将余汗县晋兴乡划出，设安仁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将安仁县撤销，划回余汗县管辖，复设晋兴乡。期间，余汗县改名余干县。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将余干县的晋兴乡划出，设长城县。武得八年（625）撤长城县，复为余干县晋兴乡。唐懿宗咸通年间（860~874），晋兴乡改兴安镇。宋太祖开宝八年（975）改兴安镇为安仁场。宋太宗端拱元年（988），安仁场升格为安仁县。从此，“安仁县”县名被固定下来。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安仁县隶属饶州路总管府所辖。至正二十一年（1361）属鄱阳府。明清时期（1369~1911），安仁县均属饶州府所辖。民国元年（1912），安仁县直属江西省管辖。民国3年（1914），因县名与湖南省安仁县同名，改名余江县，隶属豫章道。民国21年（1932），隶属江西第五行政区专员公署，署治临川县。民国24年（1935），属江西省第六行政督察区，署治上饶市。1949年5月4日，余江县解放，隶属贵溪专员公署领导。8月，改为隶属上饶专员公署。1983年7月，鹰潭市升格为江西省直辖市，余江县隶属鹰潭市管辖。

第二节 五四运动前后余江的社会状况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用兵舰和枪炮，强迫腐败卖国的清王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国家由几千年封建社会逐渐转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推翻了统治中国近280余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但是不久国家政权就被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篡夺。北洋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结为一体统治着中国。因此，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变，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余江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仍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饱受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

在政治上，北洋军阀利用手中的政权，不断加强军队、警察对城乡人民的统治，同时制订了代表他们利益的各种法律法规，如有违犯立即查办。城乡人民没有集会、结社、罢工、信仰的自由权利。当时，余江县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设置崇义、荣禄、崇德、长城4个乡24个都，每都设“保正”（地保）一个，这些“保正”就是当地农村的土皇帝，权力极大，劳动人民百事都要乞求他，如有违规，他可毒打，甚至处死。封建地主阶级则依靠封建宗族势力和族规横行乡里，欺压农民，并宣扬封建迷信，说穷富是命中注定的，穷是命不好，要想命好，只能求神拜佛，求下世投胎到富人家，以此麻痹人们的思想，强迫贫苦农民做牛做马。

1889年，帝国主义的魔掌也伸到了余江县。法国籍神甫王岐山偕同一荷兰籍同道，从江西省南昌市来到余江县邓埠镇，勾结地方土豪徐佐臣，以买地为名，强霸民地兴建一座长方形高大穹顶的青砖教堂，内部装饰得富丽堂皇（1942年日本侵略军占领邓埠时被纵火烧毁。现今的天主堂是1947年重建的，与原建筑相差甚远）。外籍神甫在邓埠镇站稳脚后，在以徐佐臣等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支持和参与下，进行传教活动，用精神鸦片

毒害城乡人民。为吸引人们加入教会，以入教者缴纳一块银圆可以吃半年饭，二块银圆可吃一年饭的小恩小惠，以及重点救济和帮人到政府说人情等手段，引诱一些半饥半饱和有困难的人们加入教会，不断发展教会势力。从此，余江人民不但受到封建官府的统治，而且直接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

1912年，美籍神甫高志从邓埠镇到县城锦江镇活动，勾结土豪劣绅，在镇内城隍庙强买徐姓私宅一栋，改建为传教所。1918年，法籍神甫田烈诺来余江主持教务，着手兴建高大教堂，凭借官府势力霸占郑家祠堂及30亩土地（包括小山、水塘），强买刘林德房地一栋，强占工友桂德堂房屋和宅基一块。在强买夏家房地时，夏步高的母亲死活不肯，遭其毒打，房地仍被霸占。锦江天主堂从1918年施工，至1922年竣工，主要建筑物有经堂、官厅、神甫和修士的宿舍等，大小共10幢。主要建筑经堂名为“圣类斯堂”，长24米，宽13米，高12米。总面积达4786平方米。外籍神甫请大批教友，分成多个传教组，赴全县各地开展传教活动，吸收教徒，信教人数猛增，城、乡和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工商界都成为它的势力范围。同时，这些外国神甫还以办义学为名，读书不要钱，在全县农村开办了多所学校。把课堂当作经堂，鼓吹“上帝万能”、“人类幸福靠上帝恩赐”，而不是自己救自己，以此从思想上麻痹贫苦农民的斗志。因此，余江教区也由一般教区升格为赣东北主教区，成为江西五大教区之一。下辖余江、玉山、上饶、弋阳、贵溪、铅山、乐平、余干、万年、宜黄、崇仁、东乡、临川、鄱阳、金溪及景德镇等十六个教区，常驻余江的外籍神甫六七人，多时达40余人。随着教会势力在余江不断扩大，外籍神甫在余江更加趾高气扬，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打人骂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

在经济上，帝国主义各国打开中国大门后，运用各种特权，把大量商品倾销到中国。余江城乡市场上塞满洋布、洋油、洋伞、洋火、洋烟、洋铲等洋货。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农村手工业商品被排挤，自给自足经济被瓦解，手工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者濒临破产境地。余江人民不仅受到帝

国主义国家商品经济的冲击和剥削，天主堂的外籍神甫还用放高利贷压榨穷苦百姓的血汗。借天主堂的谷一担，第二年要还一点七五担，甚至还二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唆使自己扶植的封建军阀争权夺利，连年混战，军费开支与日俱增。统治余江的北洋军阀孙传芳县政府就通过各种捐税强加在人民头上，悬务、漕粮、差役、课租、杂赋、壮丁税、屠宰税、印花税、营业税、债契税、修路税、房屋税、门牌税、锅灶税、不足办公税、无人照持费、烟酒税、教育费、水利捐、自治捐等等，真是无奇不有，五花八门。不仅捐税名目繁多，而且税率不断增加。穷苦农民如不交捐税，就被吊打、坐班房，被逼得卖儿卖女，出卖赖以活命的耕地。封建土豪劣绅则利用军阀混战所造成的祸害，采取各种卑鄙手段，低价购买穷苦农民的土地，致使土地日益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到大革命前夜，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全县耕地面积的70%以上，而占人口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占有的耕地面积还不到30%。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锦北许家村的调查，该村共有13户，总田亩是900余亩，3户地主、富农就占有耕地836亩，占全村总田亩的93%，雇农、贫农、中农共10户，只有耕地64亩，仅占全村总田亩的7%。

随着土地日益集中到地主阶级手中，余江农民所受的地租剥削也不断加重。早些时候，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租谷大体上是收获量的40%左右，到大革命前夜，提高到七八成。每年收获季节，地主收租还要大秤、大斗进。因此，农民终年辛勤劳动，流血流汗，收到的粮食除交地主的租外，剩下的寥寥无几，遇到水旱天灾，还要赔租。

雇工也是地主剥削农民的形式。当时，雇工有两种，一种是长工，一种是短工。长工多是自己无地，依靠当雇工生活的农民；短工多是虽有少量耕地，但还得靠出卖一些劳动力为生的农民。长工境况最悲惨，每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一年只得很少报酬；短工活最紧，工钱也不多。

此外，地主还用高利贷盘剥农民。当时，农民向地主借债有钱、粮两种形式，借钱，每月利息最高为2%，最低为1%，一般是1.8%；借粮，

一般是一担谷，第二年就要还一担二斗五升，重的是一担半。尤其残忍的是，每年青黄不接季节，农民向地主借谷一担，不到十余天就要还二担，甚至更严重的利息。据民国26年（公元1937年）《江西文献汇编》^①记载，余江县借钱户数占总农户的80%。

总之，由于帝国主义，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接二连三，余江的农业生产连续下降，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化。许多贫苦农民，因交不起捐税和地租，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只好逃离家乡，沦为乞丐。特别是在县内沿白塔河中上游的马荃、邓埠、平定方圆114平方公里的地区，流行严重的血吸虫病，由于旧政府只顾掠夺贫苦人民的财富，不管人民的死活，不知有多少人被血吸虫病吞噬了生命，大好良田成片荒芜，座座村庄相继毁灭，野坟累累，满目疮痍。

余江的文化教育也非常落后，在1911年前，除了有的地主豪绅请先生坐家教学，或是地主豪绅之间邀请举办了几所私学外，没有一所公学。1911年以后余江才渐渐办起了20几所初级小学，但入学读书的学生很少，多时不过百余人，少时只有几十人，而且大部分是地主、富农子女，穷苦农民过着悲惨生活，没有钱给子女读书。就是到大革命失败后的1929年，在国民党余江县政府的教育情况总结汇报中，对余江的教育事业的落后，仍有这样一段叙述：“余江地区偏僻，交通不便，教育尚幼稚，吾县所有学校系小学，在现有学校中，除一二校成绩稍佳外，余多腐败不堪。”^②正因为这样，在大革命时期，余江人民90%以上的人是文盲。

第三节 余江人民的早期斗争

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帝国主义、封建统治阶级的沉重经济剥削和政

^① 江西省档案馆。

^② 余江县档案馆《余江县地方革命史资料》。

治压迫，迫使农民忍无可忍，不得不自发地起来进行反抗斗争，以求生存。

1902年，余江县境南部廿一都108姓的2万多农民，不堪忍受封建官府的重重压迫和剥削，联合起来，纷纷拿起长矛、大刀、棍棒，掀起武装抗交“陈钱粮”的农民运动。广大农民不畏官府洋枪的威吓，冲进县城，擒拿知县左秉钧，迫使官府不得不答应农民的要求，取得了免交“陈钱粮”的胜利。

1914年四五月间，由于县内灾害频繁，军阀政府不加过问，地主阶级逼租逼债，穷苦农民无法生存，马祖崖一带农民，在洪江会“杀富济贫”的思想教育和发动下，首先揭竿而起，向地主和军阀政府抗粮抗税。他们为了坚持向统治阶级进行斗争，拥戴一个隆准童瞳且两手垂膝的11岁异童雷葆福为天子，封授洪江会首领柴金标为大元帅，柴土地为副元帅，在全县各地发展组织。余江县政府派军警镇压，并捉去雷葆福的父母。农民起义军聚集2000余人，手拿梭镖、大刀、土枪、棍棒冲进县城，放火烧县署，打开监狱救出被关农民。之后分股退入余江县北部和万年县山区。在北部边境的狮马源村，又利用集会、结社、吃鸡血酒，组织农民们向地主主要粮斗争，提出“财主不卖粮，闹一场饥荒大反抗，打得财主交出粮”的口号。各村寨穷苦农民纷纷订议契、打禁牌，不准地主家的粮食出村。在广大农民的斗争下，地主阶级乖乖地把囤积的粮食交给群众。这场斗争的胜利，在狮马源一带群众中留下深刻的影响，至今北部边区还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财主心似狼，饥荒不卖粮，
囤粮在谷仓，穷人大反抗。
吃血酒宣誓，村村打“禁牌”，
财主着了慌，交出囤积粮。

这支农民起义军，在领导了狮马源等村群众向地主阶级要粮的斗争后，又在万年县聚集400余人，打县署，烧毁衙署，杀毙巡长1名，监狱看役2名，缴获银圆1600余块。此后，又联络铅山、金溪、资溪等县的洪

江会组织，并在铅山县石塘街举行了祭旗暴动，击溃了前来镇压的军警，烧毁警署和商会之房屋。

军阀政府为把这支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江西军务李纯和巡按使臣戚扬派重兵“进剿”，并在余江设立清乡总局，划定鄱阳、浮梁、余江、弋阳、广丰、余干、德兴、横峰、上饶、贵溪、乐平、万年、玉山、铅山、东乡等县为清乡区域，设立清乡分局，经过2年之久，才把这支农民起义军镇压下去。在余江近代史上，这次农民起义，是一次有组织有领导、规模最大、波及面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农民同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

此外，余江各地还经常出现穷苦农民自发反抗地主阶级“收二次账”；反抗地主霸占穷人财产的种种斗争。

余江县广大农民所进行的自发斗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同时也或多或少地启发了农民的阶级觉悟和斗争信心，但是，由于没有一个先进阶级的政党来领导，提不出彻底的革命纲领，因此，根本不可能推翻封建统治，赶走帝国主义，求得自身的彻底翻身解放。

第二章 中共余江支部的建立

第一节 五四运动的影响和马列主义的传播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英、美、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这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一次分赃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了会议，并在中国人民督促下向大会提出要求取消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废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收回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利等。但是会议在美、英、法帝国主义操纵下，拒绝了中国人民这些正义要求，并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权。当时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宰割中国的“和平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反帝怒潮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5月4日，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他们高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等口号。学生们痛打了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这一运动很快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成为第一次由学生、工人和其他群众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行径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革命斗争。

当时，在北京高等师范学堂（今北京师大）读书的余江籍学生宋国模，是学生会的骨干分子，积极同全校师生一起参加了游行示威，火烧赵

家楼，痛打卖国贼等反帝、反北洋军阀政府的五四爱国运动。

北洋军阀政府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不得不宣布罢免曹、章、陆的职务，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余江后，县城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积极响应。为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上街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岛和山东的主权”、“不买日本货”等口号。当时在县城天主堂的几个外籍神甫惧怕群众运动冲击，偷偷溜出县城，逃往上海、香港等大城市避风。有人探得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全城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师生的反帝爱国游行，在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种子，唤起了余江人民的觉醒，一些爱国知识青年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

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在全国广泛传播。1924年，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迅速在全国发展，宣传革命、宣传马列主义的进步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广东的农协会刊等，也经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偏僻闭塞的余江县。在县城小学教书的进步青年教师徐文渊、李昂、万邦宪以及店员学徒董思远等阅读这些杂志后，思想不断受到这些进步刊物的影响和启迪，更加深了对封建军阀统治的黑暗社会的不满，萌发了改造社会向往革命的理想。他们经常和一些进步青年一起，谈论新思想，抨击军阀政府的种种罪行，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倾吐自己的抱负。1926年9月，北伐军分别从湖南、湖北进军江西，余江在南昌、临川、鄱阳等地读书的进步青年学生，桂文藻、余惠桑、陈琬等，在校接受了革命思想教育，纷纷回到余江与徐文渊等进步青年教师联合起来，开展革命宣传活动。

1926年10月下旬，北伐军十四军（赖世璜部）占领余江后，熊梦帷、徐文渊、李昂、陈琬、陈松如、余益、吴从汉、余国平、董思远、万邦宪，桂文藻等十余人在县城锦江镇三官堂成立了青年学会，公开提出了

“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为人民办事”的口号，并分别走上街头巷尾，向群众进行演讲，散发传单，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平均地权，减租减息，支援北伐战争等主张。同时，积极发展会员，举办各种学习会，组织青年学会会员阅读进步刊物，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提高革命斗争的信心。

从1924年起，在余江县内就出现了新老派封建势力的狗咬狗的斗争。老派成员主要是些封建遗老，新派成员主要是些年纪较轻的劣绅少爷，他们经常为争夺地方的政治经济大权互相倾轧。在北伐军占领余江后，他们看到青年学会的一批进步青年开展的革命活动如火如荼，预感自己的末路就要来临，为维护封建权势，便企图用金钱收买的办法，拉拢青年学会会员，改变其斗争方向。在遭到拒绝后，这些遗老遗少便勾结社会上的右派势力自立学会。以邹伯瑶、陈贡山为首的老派劣绅，在万寿宫成立了中山学会；以余炳南、周少伊为首的新派劣绅在火神庙成立了三民主义研究学会。他们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革命派，用革命的词藻装饰门面，鱼目混珠，妄图欺骗群众，与青年学会相抗衡。这时，青年学会会员与新老派劣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青年学会宣传部部长桂文藻等带领一批会员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揭露新老派封建劣绅压迫和剥削穷苦人民的罪恶，启发工农群众的阶级觉悟，不要被这些披着羊皮的狼欺骗，并号召群众“天不怕，地不怕，不怕劣绅穿马褂，积极行动起来，同封建势力作斗争”。这些宣传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和热烈拥护。

第二节 筹建国民党余江县党部

1926年11月下旬，桂文藻、陈琬赴余干县城，同国民党省党部特派员、共产党员曾天宇取得了联系，并被委派为筹建国民党余江县党部负责人。他们回县后即挂出了“中国国民党余江县党部筹备处”的牌子，开始

了筹建工作。12月初，曾天宇从余干县到余江县组建县党部，委派桂文藻、陈琬、倪亚彬进行党员登记。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工作，青年学会的会员全部转为国民党党员，而新老派劣绅企图加入国民党，均被拒绝。接着在青年学会会址三官堂召开了全体国民党员大会，经过酝酿候选人名单，选举了县党部领导成员，宣布正式成立国民党余江县临时县党部，规定了县党部的中心任务是宣传执行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

国民党余江县临时县党部执行委员会共7人，其成员是：徐文渊、万邦宪（万邦宪赴武昌学习未回，陈琬为执委）、黄仁溥、余柯风、吴从汉、陈如松（陈如松赴南昌参加省党部代表会未回，倪亚彬为执委）、林中吉；候补执委3人，其成员是：陈琬、倪亚彬、熊翊舜；监察委员会共3人，其成员是：潘秀生、许宝森、张翰屏；候补监委1人，桂文藻。县党部下设8个部，组织部部长陈如松，宣传部部长吴从汉，工人部部长徐文渊，农民部部长万邦宪，青年部部长黄仁溥，商民部部长余可风，财务部部长林中吉，文书部部长童有德。

不甘失败的新老派劣绅，企图加入国民党的阴谋未能得逞，亦先后将其“学会”改为县党部。一时余江出现3个国民党县党部，县城阶级斗争呈现白热化。新老派劣绅自知如果自己的县党部得不到省党部的承认，就难以生存下去。因此，他们联合起来，威胁省党部特派员曾天宇，要其承认他们的县党部。可是曾天宇只承认以青年学会为基础的县党部是省党部的下属组织，不同意与劣绅们的县党部发生联系。新老派劣绅看到威胁不成，就凭借手中的封建权力，纠集200多名流氓、打手围攻县党部，打伤数人，省党部特派员曾天宇也被打伤。曾天宇一面打电报向省党部汇报，一面到县政府晋见县长熊永荣，提出要惩办凶手。劣绅们害怕受到惩罚，又托人出面求情，表示愿意赔礼道歉。适逢省党部即将召开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有很多事情要做，只好接受劣绅们的公开请酒赔礼，并在孙中山像前做检讨，自行撤销其设立的两个所谓县党部组织。

在挫败新老派劣绅篡夺县党部权力的阴谋后，县党部组织了4个宣传

队，在县城塔前、彭家巷、火神庙、县政府门前等街道，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号召群众组织起来，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取缔高利贷，提倡男女平等，反对买卖婚姻，破除迷信。不久，又派出农民部部长万邦宪赴武昌，参加湘鄂赣3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

第三节 建立中共余江支部

1927年1月1日至15日，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余江县党部选出徐文渊、陈如松、陈琬、倪亚彬、严廷干5人为代表，出席全省国民党代表大会。在省参加大会期间，共产党员曾天宇介绍徐文渊与省农协特派员、共产党员郭燕台会见。同月下旬，中共江西区委派郭燕台来余江指导农民运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郭燕台到余江后，县党部召开了全体委员会，汇报了余江工农运动开展的情况。不久，郭燕台在县党部挑选了积极分子徐文渊、李昂、李馥3人，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县城锦江镇王家山王济才家举行宣誓仪式，成立了余江县第一个党组织——中共余江支部，徐文渊任党支部书记，隶属中共江西区委。

在工农运动的发展中，为壮大党组织，又先后发展了余惠桑、董思远、熊梦帷、桂文藻、范歧山、吴万有、宁大任等一批工农运动骨干分子为共产党员，到2月止，党员人数已增加到12人。

第三章 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第一节 农协、工会组织的成立

余江县的工农组织，在国民党余江县党部成立后即着手筹建，由于未得到上级的指导，只停留在宣传准备阶段。省特派员郭燕台到余江后，在建立党组织的同时，即指导县党部制定了农协、工会组织成立方案，规定参加农协的对象是：雇农、半自耕农、自耕农、佃农4种成份。参加工会组织的对象有产业工人、店员工人、手工业工人、小商小贩等。1月下旬先后召开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讨论和规定了农协、工会组织的发展和工农运动的内容和任务，选举了领导成员，成立了余江县农民协会和余江县总工会。

县农协执委有：李馥、熊梦帷、余惠桑、宁大任、余国模、李怀普、吴松乔、倪子成、万安远9人；监委有桂文藻等3人，并设立了常务委员会，由李馥、熊梦帷、余惠桑3人担任常务委员。机关设在火神庙。

县总工会执委有：徐文渊、陈子忠、李连生、童子峰、曾公益、周绍昌等11人；监委有3人，机关设在城隍庙。

农协、工会的主要任务是：（1）惩办土豪劣绅；（2）不准老板打骂压迫工人；（3）开展减租减息；（4）增加工人工资；（5）破除封建迷信等。

县农协、工会成立后，在工人、农民中挑选了一批积极分子，建立了

一支工农自卫队，负责工农运动的保卫工作。

共产党员李馥、徐文渊都分别在县农协和县总工会担任了重要职务，因此，县农协和县总工会一成立就在中共余江支部的领导下。共产党员带头深入基层，帮助区、乡、镇建立工会、农会组织，至2月下旬止，全县10个区和部分乡先后成立了农会，锦江、邓埠2个镇相继成立了商民协会、店员青年工会、石匠工会、木匠工会等组织。

第二节 工农运动蓬勃开展

农协和工会组织成立后，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为提高工人、农民的阶级觉悟，把工农运动推向高潮，广泛地开展了宣传活动。农协规定每星期一为纪念周日，每逢这一日，农协要组织农民学习进步刊物，宣传革命道理；宣传打倒地主阶级，一切权力归农会；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宣传破除迷信，改良民间陋俗等。共产党员桂文藻、范歧山在铁山一带农村，还多次召开贫苦农民大会，发动农民群众与豪绅地主作斗争，开展二五减租，反抗重利滚剥，规定年利息不得超过20%。共产党员董思远在锦江镇，将所在的祝益和豆腐店作为集会场所，多次召集工人召开座谈会，讲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贫穷困苦的原因，指出工人阶级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得到解放，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革命中必须打先锋起领导作用等，启发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同时，提出了“保障职业，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拥护，加入工会组织的工人越来越多。店员青年工会每天晚上革命也搞得轰轰烈烈，提出要与老板算剥削账，不准老板解雇工人。

封建劣绅和反动资本家视农协、工会为眼中钉、肉中刺，极力阻止农民、工人加入工农组织，千方百计破坏工农运动。为了打击封建劣绅和资本家的嚣张气焰，经党支部研究决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共产党员、商民协会会长范歧山发动工农群众捉到破坏工农运动的资本家张右新和张业